

(清) 汤球辑 杨朝明校补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JIU JIA JIU JIN SHUJI BEN

九家旧晋书

辑本



九家旧晋书辑本

〔清〕汤 球 辑

杨朝明 校补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九家旧晋书指臧荣绪《晋书》、王隐《晋书》、虞预《晋书》、朱凤《晋书》、谢灵运《晋书》、萧子云《晋书》、萧子显《晋史草》、沈约《晋书》、何法盛《晋中兴书》。诸书均成于两晋或稍后的南朝,是两晋史事的珍贵记录,惜自唐《晋书》问世后,逐渐湮没无闻,给治晋史者造成诸多困难。鉴此,清人多有对之辑佚整理者,其中尤以汤球《九家旧晋书辑本》最著名,颇为学界推重。杨朝明同志对汤辑本进行了标点、校勘和补辑整理,使之更趋完善,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。书前有《试论汤球〈九家旧晋书辑本〉》一篇,对九家旧晋书及其亡佚、《辑本》的特点、史料价值、存在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,具有指点门径的作用。

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

九 家 旧 晋 书 辑 本

〔清〕汤 球 辑 杨朝明 校补

责任编辑: 郭孟良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辉县市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5.5印张 346千字

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0册

ISBN7-5348-0384-5/K·79 定价: 7.40元

试论汤球《九家旧晋书辑本》

——代前言

“两晋六朝，百学芜秽，而治史者独盛。”^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400年间，虽然政治上四分五裂，但史学却有长足的发展。在摆脱了传统的经学束缚之后，许多文人学士抛弃经书章句，纷纷转向史学研究和史书的编写。当时，“一代之史，至数十家。”^②晋史自然也是这样。晋人写当朝历史的就有一二十家，再加上南北朝时期的晋史著作，其数量已十分可观。然而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保存至今的却寥寥无几，以至于我们现今研究两晋150多年的历史只能以唐修《晋书》为主，而众多的晋朝旧史只能赖依类书和古注等保存其一鳞半爪。在两晋时期的史料较为缺乏的情势下，这无疑是研治晋史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。基于此，清朝学者如黄奭、陶栋、汤球、王仁俊、毕沅、王谟等都曾对两晋时期的史料进行辑佚整理。其中，汤球成就尤最，《九家旧晋书辑本》（以下简称为《辑本》）即其辑著之一。

一 九家旧晋书及其亡佚

由于诸家旧晋书已经亡佚，论者在对各书进行评述时，多依据唐初所成的《晋书》和《南史》等书。但是，唐初史臣的记载并不可靠，他们带着自己的偏见有意贬低旧书，致使人们也认为诸家旧史亡佚的主要原因是质量太差。又，汤球《辑本》的材料多来自类书及文史之注，而类书也有辗转相抄的现象，有的并非直接采摭原书，而是从唐修《晋书》成书前的类书抄撮而来，所以，后出类书只称为《晋书》的材料，有很多属于唐朝以前所成旧史。如果不明确旧晋史何时亡佚，那么，就有可能遗漏这部分材料。因此，有必要对九家旧晋书及其亡佚的大致时间有所了解。

(一)九家旧晋书略考

唐朝初年,唐太宗李世民在《修晋书诏》中曾说:“前后晋史十有八家。”其实,正如清人浦起龙所说,这仅是在敕修《晋书》之始,举一成数,“罗致群书”^③而言。据统计,两晋南北朝时期仅著成的晋史就有30余家。^④汤球所辑者,乃是留下佚文的九家纪传体晋书:臧荣绪《晋书》、王隐《晋书》、朱凤《晋书》、虞预《晋书》、何法盛《晋中兴书》、谢灵运《晋书》、萧子显《晋史草》、萧子云《晋书》、沈约《晋书》。

九家旧晋书原书现在虽已不存,但从一些文献记载中,仍可了解其大致面貌。

王隐、虞预、朱凤三人之书成于晋朝。

王隐字处叔,陈郡陈(今河南淮阳)人。其父王铨,仕历阳令,有著述之志,私撰西晋史事及功臣行状,未成而卒。王隐继承父志,对于西晋旧事,了解颇多。太兴(公元318—321年)初年,他与郭璞一起被召为著作郎,开始撰著晋史。据《晋书》卷八二《王隐传》:“时著作郎虞预私撰《晋书》,而生长东南,不知中朝事,数访于隐,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,所闻渐广。嗣后更疾隐,形于言色。预既豪族,交结权贵,共为朋党以斥隐。竟以谤免,黜归于家。”后来,因家境贫困,又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,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了《晋书》。

但是,《王隐传》说他“既好著述,而文辞鄙拙,芜舛不伦。其书次第可观者,皆其父撰;文体混漫,义不可解者,隐之作也”。这当是对王书的诋毁之词。唐修《晋书》记载本身即不统一,《王隐传》又称他“少好学”,“博学多闻”。王隐认为:在当时政权更代、战乱频仍的历史时代,旧事极易荡灭,因而,应该将“得诸闻见”的华夷成败的事实“述而载之”,撰著成书,以“明乎得失之迹”。这说明他对于国史修撰有较为可取的见解。^⑤当时,祖纳向晋元帝推荐王隐,说他“清纯亮直,学思沉敏……若使修著一代之典,褒贬与夺,诚一时之俊也。”记室参军钟雅也称王隐“有史才”^⑥。魏李彪求修史之辞说:“晋之世有佐郎王隐,为著作虞预所毁,亡官在家,昼则樵薪供爨,

夜则观文属缀,集成《晋书》,存一代之事。”^⑦象王隐这样一个人,写出的大概不会是一些“文体混漫,义不可解”的东西。

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,王隐《晋书》原书 93 卷。此书体例比较完备,纪、志、列传俱全。所不同的是改“志”为“记”,如《地道记》即一般史书的《地理志》,《礼乐记》即《礼乐志》,它只是更换了一下名称而已。

虞预字叔宁,会稽余姚(今属浙江)人。东晋初,历仕会稽郡主簿、佐著作郎、秘书丞、著作郎、散骑常侍领著作。他实有著述之才,不仅有《晋书》40 余卷,而且还有《会稽典录》20 余篇、《诸虞传》12 篇,皆行于当世。但据《晋书》的记载,人们认为虞预《晋书》乃抄自王隐。由于缺乏记载,事实真相已不能确知。而其史体也难以详考,仅知虞预《晋书》可能有《艺文志》,南朝梁任昉赠王僧孺诗言:“刘《略》班《艺》,虞《志》荀《录》,伊昔有怀,交相欣勗。”据罗常培先生考证,诗中所云虞《志》,当即虞预《晋书·艺文志》。^⑧

朱凤《晋书》佚文不多,史籍有关朱凤此书的记载也很少。只知朱凤曾因“学行清修,老而未调”^⑨,并“有史才”^⑩,被华谭推荐为著作佐郎。后来,他又任中书郎。朱凤《晋书》本 14 卷,为未成之作。

由于他们为东晋学者,所以,虞预《晋书》讫于明帝,朱凤《晋书》讫于元帝。至于王隐《晋书》,《修晋书诏》称:“处叔(王隐)不预于中兴”,王书当尽西晋而止。

晋朝以后曾编著晋史的,首先是南朝刘宋时的谢灵运、何法盛。

谢灵运,陈郡阳夏(今河南太康)人。他是谢玄的孙子,晋时袭封康乐公。宋文帝时为秘书监,整理秘阁书,补足遗阙。宋文帝“以晋氏一代,自始至终,竟无一家之史,令灵运撰《晋书》。粗立条流,书竟未就”^⑪。《隋志》著录其书 36 卷。《初学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通典》等都有引谢灵运《晋书·百官志》的条目,《太平御览》卷六十九述其《止足传论》,知其书虽然只完成了一部分,但已用纪、志、传之体。

何法盛为宋湘东太守,其《晋中兴书》记述了东晋一代的历史,此为唐初保存较为完整的晋书之一。刘知几对此书颇为称道,他说:《晋中兴书》“勒成一家,首尾该备”^⑫,又说:“东晋之史,作者多门,何氏《中兴》,实居其最。而为晋学者曾未之知,倘湮灭不行,良可惜也!”^⑬但是,李延寿在《南史》卷三十三《徐广传》中却说《晋中兴书》并非何氏自撰,而是高平郗绍所作,何法盛欲赖著述流声于后,遂窃其书。而郗绍“无复兼本,于是遂行何书”。后来,人们大多也据而认为此非法盛之书。^⑭对此说法,清人姚振宗表示怀疑,他说:“何法盛,《宋书》无传。按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之《徐广传》皆不附是事,惟《南史》有之,不知是否实录。”^⑮但不论是书出自谁手,其本身的史料价值并不受到损害,诚如浦起龙解释刘知几的话时所说:“夫何果窃,而书果善,固无伤于‘居最’一语也。”^⑯

《晋中兴书》之编制名目与众不同。《史通·表历篇》云:“法盛改表为注。”《题目篇》说:“何氏《中兴》,易志为说。”如《悬象说》实即《天文志》,《徵祥说》乃《五行志》等等。何之元《梁典·序》又说:“法盛晋书,变帝纪为帝典。”合《文选》注、《唐类函》、宋《御览》考之,法盛书又有《顺阳范录》、《琅玕王录》、《颍川庾录》、《陈郡谢录》等等。章宗源也考证说:“盖典、注、说、录四体,以易纪、表、志、传也。”^⑰

到了南齐,东莞莒(今属山东)人臧荣绪撰修《晋书》,始括西晋和东晋为一书,这是第一部关于两晋史事的完整《晋书》。此书纪、录、志、传共110卷,规模较大,体例完整,只是其《录》体所记何事已不可考。正因为臧氏《晋书》记载了两晋全史,唐初修《晋书》前,人们往往径以《晋书》相称,在诸家之中,它成了最为通行的本子,甚至唐《晋书》脱稿后它仍被称为《晋书》,而唐修书却被称为“新《晋书》”。贞观年间所修是书,即以臧荣绪书为底本,所以,两书各《志》也基本一致,同时还可察见唐修《晋书》承袭臧书的痕迹。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关于《百官志》、《律历志》、《舆服志》和《礼乐志》等的论说指出,唐《晋书》的这些书志篇名都是承袭了臧氏《晋书》。内

容方面也是如此,把汤球《辑本》中的臧书佚文与新《晋书》比较,发现有许多文句两者相同。

沈约、萧子云、萧子显三家晋书成于南朝萧梁时代。

沈约字休文,梁吴兴武康(今浙江德清西)人。历仕宋、齐、梁三朝。他“少颇好学,虽弃日无功,而伏膺不改”^⑨。其著述有《齐纪》、《高祖纪》、《述言》、《谥例》等,尤以《宋书》著名。20余岁时,臧荣绪书尚未出,沈约以晋代无一全史,即开始撰述,历时20余年,成《晋书》120卷。但在“条流虽举,而采缀未周”时,又“遇盗失其第五帙。”^⑩所以,《梁书》和《隋志》所载只有110卷。

萧子云字景乔,南朝梁南兰陵(今江苏武进西北)人。弱冠时因晋无全史而留心撰著,至年26,书成110卷。据载:其著晋史“至《二王列传》,欲作《论草隶法》,言不尽意,遂不能成,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。”^⑪萧子显为子云之兄,字景阳,其《晋史草》一书,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本传俱不见载。姚振宗认为此书“盖未成之作,史略之也”。

大概沈约和萧子显二人之书皆非完整定本,子云《晋书》虽有百余卷,但臧荣绪书已经行世,故三书传本不多,后来散佚也很快。

由于诸书难成完帙,我们已无从知其详细。诚然,九家旧晋书参差不齐,自有优劣之分,应该视其佚文多寡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。但他们大部分质量并不低劣却是可以肯定的。南宋高似孙曾细读众家晋史佚文,并各举数例进行论说道:“王隐、谢沈(案:高氏所列文为:‘窦武、刘淑、陈蕃少有高操,海内尊而称之。’此非谢沈《晋书》,而是《世说新语·品藻篇》注所引谢沈《后汉书》之语)、虞预、沈约、朱凤晋书,世不可观,各录其魂精一二于前,斯足以表诸公才之俊,笔之英矣!”^⑫唐太宗在《修晋书诏》中说各家“才非良史,事亏实录”并非的评。至于旧晋史“芜舛不伦”、^⑬“喜造奇说”^⑭之类,则是因为当时玄学盛行,儒道思想笼罩,在这种情况下,连唐修《晋书》也免不了宣扬鬼神迷信,著录荒诞无稽之说,更何况唐太宗对于各家晋书的评价已经定了调子,唐初史臣们也只好依调唱和。因此,他们在《晋书》或《南史》等书中,或公然施以贬词,或加进

一些偷抢之类的故事,有意压抑旧晋史,当亦在情理之中。

(二)九家旧晋书的亡佚

在九家旧晋书中,沈约《晋书》是亡佚最早的一种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:“梁有沈约《晋书》一百一十卷,亡。”可见,唐初修撰《晋书》前此书已经不存。其余诸家,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均有著录,见《旧晋书著录情况表》。

旧晋书著录情况表

著者	书名	原卷数	隋志	旧唐志	新唐志
臧荣绪	晋书	110	110	110	110
王 隐	晋书	93	86	89	89
虞 预	晋书	44	26	58	58
何法盛	晋中兴书	78	78	80	80
谢灵运	晋书	未成	36	35	35
萧子云	晋书	110 ^②	11	9	9
朱 凤	晋书	14	10	14	14
萧子显	晋史草 ^③	30	30	30	30

从表中史志的著录情况看,从书成直到亡佚时,除了臧荣绪、萧子显书的卷数未变外,其余各家卷帙都有所不同,这说明各书不仅在《唐志》所依据之书撰成时都尚存在,而且有的书或者卷帙有分合变化,或者流行着不同的本子。

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是依唐毋𪚩的《古今书录》(又名《四部书录》)編集而成。《古今书录》所著录的书籍皆在唐玄宗以前,开元以后皆付阙如。而刘昫等撰《旧唐书》时,也因陋就简,仅“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”,也就是说,《旧唐志》反映的是唐玄宗时期的存书状况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虽为宋朝所修,但它亦系根据唐代目录书《开元四库书目》所修成,是书《崇文总目》著录四十卷,宋朝初年尚存,故欧阳修得以据而纂入其书。《开元四库书目》反映的亦是唐玄宗时的存书状况。所不同的是《新唐志》又加入了唐人自著的书数万卷而已。从表中看,两《唐志》著录旧晋书的情况完全相同,当亦说明

它们都是唐中期前存书情况的著录。

唐朝中期以后,政局动荡不安,书籍因而也遭到空前浩劫:

安禄山之乱,尺简不藏。元载为相,奏以千钱购书一卷,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。至文宗时,郑覃侍讲,进言经籍未备,因诏秘阁搜采。于是,四库之书复完,分藏于十二库。黄巢之乱,存者尽鲜。昭宗播迁,京城倒置,使孙惟晟剑书本军,寓教坊于秘阁,有诏还其书,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诸道求购。及徙洛阳,荡然无存矣。^②

经过这几次书厄,唐代典籍焚毁殆尽。诸家旧晋书不仅《宋史·艺文志》没有著录,而且其他五代以后的目录书也均未见载。大概它们在唐代中期以后的战乱中亡佚。

汤球《辑本》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出自《太平御览》,其它宋代所成书籍也有零星载录(见附录一),但这并不能说明诸家旧晋史北宋尚存。在《太平御览》成书之前,已经有《修文御览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文思博要》等类书,北宋编修《太平御览》时,即以这些类书为蓝本,参详条次,修葺增删而成,并不是直接采摭原书。《御览》引旧晋书有避唐讳处,其所引《四民月令》,有的称为《四人月令》,其材料显然来自唐代类书。

《太平御览》中亦有很多旧晋史引文不避唐讳,而且有的是径称引自《晋书》,但内容却不是唐修《晋书》,这当是从《修文御览》转抄而来。《修文御览》又称《修文殿御览》,是北齐后主高纬时代官修的一部类书。这部类书传世时日较久,南宋时还全部存在,《中兴馆阁书目》、《遂初堂书目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都有著录。据近人曹元忠考证,《太平御览》不仅内容条文多取材于《修文殿御览》,即其体例亦摹拟搬取。^③唐修《晋书》前,臧荣绪《晋书》比较通行,^④它是旧晋书中较为完整的一部,《修文殿御览》当以《晋书》相称,以《太平御览》引《四民月令》例来看,它在转引《修文殿御览》中的《晋书》时,书名仍旧是很自然的。

《太平御览》引书较多,但所引诸书当时已大部不存。南宋目录

学家陈振孙说：

或言国初古书未亡，以《御览》所引用书名故也。其实不然，特因前诸家之旧尔。以《三朝国史》考之，馆阁及禁中书总三万六千余卷，而《御览》所引书多不著录，盖可见也。^{②③}

按《三朝国史》为记载宋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历史的史书，其《艺文志》应反映了宋初三朝皇家的藏书实际。陈振孙提出的这个证据，有力地说明了北宋初年编《太平御览》时所引用古籍不一定为当时确实存在的。所以，我们也不能因为《御览》曾引而断言旧史宋初尚存。^{②④}

至此，我们已经有了理由推断，诸家旧晋书在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中即开始散佚，最晚在五代时已尽数亡佚。至于宋代及以后的书中时有征引，那当是转引自前成类书或文史之注。如《事类赋注》就引用了不少旧晋史之文，但其作者吴淑正是《太平御览》的编撰人之一，大概其情形与《御览》相似，也系从其它书籍转抄而来。

诸家旧晋书之所以亡佚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无可否认，九家旧晋书也各有一定的缺点，但其亡佚也决不都是因为质量低而被自然淘汰。^{②⑤}诚然，如前所说，象谢灵运、沈约、萧子显等书可能并非完整定本，其散佚较快，此当是其重要原因。其它各书却并不也都如此，虽然各家旧晋书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缺陷，即由于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制，就很难做到记录完全，贯通两晋十六国全部史事。但是也正是因为各书著者所处时代距离晋朝较近，书中的材料便相对直接，因而保存下来的是许多“得诸闻见”的著录，而非华文少实，不足行远的空谈，这又是他们大致相同的优点。唐初距离晋朝已二百多年，因而贞观重修《晋书》时，旧晋史的材料被录用很多，臧荣绪书更成为唐修《晋书》的蓝本。^{②⑥}如果说其它旧晋史具有载录不全的缺陷，那么，臧荣绪书“括东、西晋为一书，纪、录、志、传百一十卷”，当记载了两晋全史。正如清人王鸣盛所说：此书“勒成司马氏一代事迹，各体具备，卷帙繁富，谅有可观，即以垂世，有何不可？”^{②⑦}显然，这都不是旧史亡佚的根本原因。

此前,唐太宗曾两次诏修前史,但都未曾提及晋史,唐高祖李渊前此亦有《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》,亦未问津《晋书》,为什么到了贞观二十年的唐太宗后期又要重修呢?从《修晋史诏》看,唐太宗对旧史的不满意是重修的一个重要原因,但是,它至少不能是根本原因。我们认为,贞观末年单独诏修晋史,还有其它因素,这就是,唐太宗要借重修《晋书》之机来为自己不合封建礼法的行为辩解,如玄武门之变时,他杀兄逼父,夺得帝位,后又灭绝建成、元吉后祀等等;同时,他还借机炫耀文治武功,并探讨统治方略。他是在借类似现实的某些晋朝史事发表自己的言论,在新修的《晋书》中掺入了明显的政治因素。对唐统治者来说,《晋书》修撰的政治意义大于其学术意义。^④为此,唐太宗必须强调晋史重修的必要性。于是,他把诸家旧书斥为“著作虽多,未能尽善”;“才非良史,事亏实录”,臧荣绪《晋书》亦“烦而寡要”。^⑤这样,各家旧书被抹上一层暗淡的色彩。相反,在新修的《晋书》中,唐太宗亲自为《宣帝纪》、《武帝纪》、《陆机传》、《王羲之传》写了史论,给《晋书》挂上了“御撰”的牌子。旧史被压低,新书被抬高,又加新《晋书》在众家晋史基础上,由官府组织力量集体撰成,并用以赏赐外国使者,其影响自然远远超出旧晋史。

清人评论说:“刘知几《史通·外篇》谓:贞观中有诏,前后晋史十有八家,未能尽善,敕史官更加纂录。自是言晋史者,皆弃其旧本,竟从新撰。然唐人如李善注《文选》、徐坚编《初学记》、白居易编《六帖》,于王隐、虞预、何法盛、谢灵运、臧荣绪、沈约之书……并见征引,是旧本实未尝弃。”^⑥说明这些书并非不脛人望的俚言俗说,它仍有新《晋书》所不能替代的作用。只是强有力的政治因素,必然影响到旧晋书的传播。在这种情况下,又加之印刷困难等客观原因,传本越来越少,最后,在唐朝中后期的战火燃过之后,诸家旧晋书也就悄无声息了。

二 汤球《辑本》的特点和优点

汤球(1804—1881年)字伯玕,安徽黟县人。同治六年举孝廉方正。汤球十分重视操守,向以德行闻于乡里。他覃精锐思,博闻强识,曾治畴人之学,通晓星纬历算。

汤球早年从学于同县著名皖派经学家俞正燮和著名学者汪文台,受他们的影响很深。清末曾任广雅书局提调的王秉恩称赞汤球道:“宣、歙间,学者宗之。黟山县僻小,而士皆潜心学术,实君为之倡也。”^②咸丰初年,太平天国起义军攻进皖中,汤球躲避他乡。他虽精通星纬历算,甚至《开元占经》悉能成诵,但却“不屑以艺事名”。^③于是,太平天国起义军失败后,遂聚书数千卷,闭门著述。曾辑《郑康成逸书九种》、刘熙《孟子注》、刘珍等《东观汉纪》、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、譙周《古史考》、《傅子》、《古今注》。此外,汤球的著述便以对两晋时期史料的辑佚整理为主。

汤球堪称晋代史料辑佚专家。他“读史用力于《晋书》尤深,广搜载籍,补《晋书》之缺,成书数种”^④。除《九家旧晋书辑本》外,还有《晋纪辑本》、《晋阳秋辑本》、《汉晋春秋辑本》、《三十国春秋辑本》、《十六国春秋辑补》。汤球的上述辑著都收入广雅书局《史学丛书》中。另外,他还曾辑录十六国偏霸各史以及研究晋史的其它有关资料,如诏令、仪注、起居注、文集以及地理书等,这些辑文都曾经成稿,可以想见,汤球在晋代史料的辑佚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功夫。

汤球的《九家旧晋书辑本》原称《晋书辑本》,以与其《晋纪辑本》、《晋阳秋辑本》等相对应。清代中期以后,刊刻丛书之风出现高潮,在这种情况下,把每类应用的书籍刻于一部丛书之内,即辑刻专著的丛书便随之出现。民国初年,番禺徐绍桀等择定150余种汇为《广雅丛书》,其属于史学者93种,别为《史学丛书》,汤球《晋书辑本》即被收入其中。是为汤球此辑本的最早版本。民国24年,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时,又据《史学丛书》本排印,并

改名为《九家旧晋书辑本》。《丛书集成》本遂成为较为流行的版本。

除汤球外,清代学者如黄奭、陶栋、王仁俊、毕沅、王谟等都曾经从事旧晋书佚文的辑集整理,但无论是辑集数量,还是用力的深度都不及汤球。将汤氏辑本与其它各家比较,便可发现汤球《辑本》有以下显著特点:

(一)辑录较全

汤球所辑九家,黄奭《黄氏逸书考》全辑,但其搜采各书的佚文数量却不及汤氏。以虞预《晋书》为例,《三国志》卷二十一《嵇康传》注和卷二十二《卢毓传》注等处所引条目,黄本漏辑。对照汤、黄两辑本可知,黄本所辑者,汤本全录,而汤本辑收者,黄本却遗漏数则。谢灵运《晋书》也如此,汤球辑得 11 则,而黄奭仅得 8 则。其他各书两本相较,黄本遗漏处亦不少。

臧荣绪《晋书》辑本汤、黄两家差异最大。汤球认为:“臧荣绪括东、西晋为一书,成纪、录、志、传百一十卷,可谓集晋书之大成矣。故后人引其书虽标名者固多,而未标名者亦不少。”^⑩这就是说,有的类书所引称“《晋书》曰”者虽有唐修《晋书》,亦间有臧荣绪《晋书》。唐以后所成之类书,其引《晋书》之文,有的笔法与新《晋书》不同,这些书所引之文虽有唐修《晋书》,然亦有贩自唐以前类书而来的。如前所说,《太平御览》便多从前代类书转抄其文。因此,汤球搜辑佚文时,便将《御览》引《晋书》诸条文一一与新《晋书》对勘,凡遇有与唐修书字句歧异者便辑出,排入臧荣绪《晋书》辑本中。但黄氏于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晋书》诸文形同未见,一条也没辑录,其遗漏定然不少。汤球臧书辑本在数量上超出黄本很多。

陶栋的辑佚成果收到《辑佚丛刊》中,但他仅辑臧荣绪、王隐、何法盛三家,而且各书亦辑佚未备。如王隐《晋书》,陶氏仅得两卷,上卷为《诸帝纪略》,下卷为《诸臣传略》,末附《地志》3 则,共 75 则而已。汤球王隐《晋书》辑本则远远超出陶本。王仁俊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》之中,也仅辑臧、王、何三家。其本后出,在个别地方对前属辑本略有所补,但辑佚未备仍是其明显缺陷。至于毕沅、王谟,他

们仅辑王隐《晋书·地道记》。汤球辑王书,其《地道记》即在毕氏基础上成书。毕沅谙通晋代地理,其所辑王隐《晋书·地道记》收入《经训堂丛书》,把汤球《辑本》与《经训堂丛书》中的毕沅《地道记》辑本比较,可以发现毕沅漏辑者,汤本绝大部分未有;毕氏出现的错误,汤本也几乎全袭,汤本据录毕本是很明显的。应当指出,汤球简单地抄录他书,错而未改,缺而不补是不对的。但是,其数量却不会亚于毕本,而是稍有增加。王谟《汉唐地理书钞》中的《地道记》辑本则不仅收辑不周,而且因袭明代以来的辑佚之弊,不注佚文出处,令人无从稽考。显然,王隐《晋书·地道记》辑本,汤氏比王氏为好。

汤球辑录较全,首先表现在他搜及的书籍较多,而且有的还检索了不同版本。除常见类书和古注外,象《编珠》、《白孔六帖》、《本草拾遗》等也都逐一检索收录(参见附录一)。汤球搜录了《编珠》中的材料更是他本所不能攀比的。《编珠》为隋杜公瞻所撰,现存第一、二两卷。但是,此书《隋书·经籍志》未曾著录,旧、新《唐志》但有杜公瞻《荆楚岁时记》,而无是书。《通志·艺文略》卷七《类书》始著录说:“《编珠》五卷,隋杜公瞻撰。”但后来传本也非常稀少,几无称及之者。至康熙廿余年间,詹事府詹事高士奇始从内库废纸中得之,增补刊刻而传之,盖汤球辑录时便依据此本。《编珠》出现较晚,故引起人们的怀疑,如张心徵《伪书通考》就认为它是伪书,特别是高氏得本以后又补续以行,其行径亦引起人们怀疑,认为它不是先唐著作,故其中征引古籍,清代辑佚学者几乎没有加以利用的。但此书实非伪品,近人余嘉锡首先辨明它并不是清初人的伪作。胡道静又作《编珠残二卷引书考》,进一步证明此实杜公瞻原书。卷帙虽少,而征引古籍文字尚多出于隋、唐、北宋类书之外。清代学者因疑而不信,在校勘、辑佚工作中遗留下一点小缺憾^⑨。黄奭、陶栋等没有收录,这同样并不恰当。黄氏等搜及罗泌《路史》、高似孙《史略》、陶宗仪《说郛》,表面看来,似乎搜集较广,但这无疑于舍本逐末,因为这些书成书较晚,晋代旧书材料都不出现存前成类书。汤球似乎

检索未及,而所失极少。

汤球辑录较全,还在于他对各书搜检比较细致。辑本中有很多例子,此不赘举。

(二)力图恢复原书面目

汤球《辑本》与他本的明显不同,是汤氏力图按照旧书原来的样子排列所辑佚文。诸家旧晋书因早亡佚,留存下来的零星资料已难以说明原书的具体面目。但是,从后来的文献记载中亦可窥得原来体例之大概,如刘知几《史通》就曾对诸家旧晋史进行评说,从这类文献中可知王隐改志为记,谢灵运《晋书》有《百官志》等等。所以,《辑本》中,臧、王、何、谢诸书皆明显符合纪传史体。凡类书等已注明引自某书的某部分者,直接列出,而将佚文排入;那些没有注明引一书的哪部分者,便依其内容分类,或入纪、传,或入志、说。而志、传等的排比顺序又大体以唐修《晋书》为据。对于唐《晋书》中没有专传的佚文,则视其具体情况,而将它们排入恰当位置。汤球如此处理,不仅使读者容易产生对原著的大概认识,而且查检材料也比较容易。

黄奭辑本则不然,其所辑材料凡涉及人物者,前列人名,后列条文;不涉及人物者,也别拟一标题,列文于后。据章宗源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,《水经注》等所引《地道记》即王隐所撰《晋书》中的一部分;各书所引《晋中兴征祥说》亦为何法盛《晋中兴书》的一部分。而黄奭却把王隐《晋书·地道记》、何法盛《晋中兴征祥说》作为附录,分别排于各自的晋书后面。陶栋辑本也是这样,首列《诸帝纪略》,次列《诸臣传略》,而将其它佚文附后,这便不似汤球《辑本》那样易于检索和观察原书的大致体例。

(三)对佚文材料处理灵活

汤球与其它辑佚家有所不同,他读史于《晋书》用力较深,而且其辑佚工作也主要是搜求晋代史料。因此,他对晋朝历史比较熟悉。正由于这个原因,他在辑录旧晋史材料时显得不拘一格,在不改动原意的情况下,对材料进行灵活地处理,这是汤球《辑本》的明

显特点。他在遇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书籍征引同条内容时,便将他们合于一处,错者改之,缺者补之,或择优而取。另有一些条文,其叙事跨度颇大,据新《晋书》内容顺序,中间可加入其它条文。所以,汤球不仅有时合两条或数条为一条,有时又拆一条成两条或数条。

还有一些佚文,由于刊刻或传抄等的不当而造成错误,汤球则对材料细心考证,有所选择,佚文中的错误也有所更正。其它各家如黄奭等在辑佚时则大多随文抄录,以致谬戾层出。汤球虽然改动部分佚文,但为之注明,因而比仅仅随文而抄似乎较妥。

总而言之,汤球在旧晋书的辑佚中表现出了较高的学术识见。他力克前人辑佚之弊,不仅佚文皆注出处,而且数书同引时则举其最先者,除极少数外,其佚文大多出自唐宋以前书籍(见附录一)。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总结出鉴定辑佚书优劣的标准,要求一部好的辑佚书必须既求其备,又求其真,并且原书篇第可整理者要极力整理,求还其书本来面目。通过与其它各家旧晋书辑本的比较,我们已清楚地看出,汤球《辑本》这些都已做到,从这个意义上讲,我们总结的汤球《辑本》的前两个特点,也是它的明显优点。汤氏《辑本》确属辑佚书中的上乘之作。

三 汤球《辑本》的史料价值

臧荣绪、王隐、何法盛等诸家旧晋书虽然已被唐修《晋书》所取材,后来又遭到散佚的厄运,但这并不能损害汤球《辑本》的史料价值。如把唐修《晋书》与《辑本》对勘,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少异文。当然,我们的观点并不是无论什么材料都越多越好,但对于1500多年前的晋朝历史的研究,材料毕竟相对很少。《辑本》中收录的虽多是旧晋书的断句残章,但其中确也有许多为唐修《晋书》所未载,或载之不全以及载而有误的材料,它虽然是旧史的很小部分,但对唐修《晋书》等有关两晋历史的记载来说,“其缺者可以传一朝之文献,其同者可以参其是非,校其优绌。”^②它们有着对于新书的补充和修正作用,同时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新、旧《晋